

選舉競爭與政治分歧結構的變遷： 國民黨與民進黨勢力的消長*

徐火炎**

本文從分析解嚴前後選民的黨派投票行為，來看國民黨與民進黨勢力的消長，亦即從「政黨與選民」的關係來分析政黨競爭與臺灣政治分歧結構的改變。世界上幾乎所有實施威權統治的政黨，在民主轉型中的大選，都不能獲得選民的支持而下臺，但臺灣的國民黨卻是少數的一個例外。本文認為要了解威權統治臺灣長達三十多年的國民黨，所以能夠在民主轉型過程中維持主導的統治地位，必須從分析政黨與選民之間的關係、以及政黨所代表與動員的政治分歧基礎著手。透過分析國民黨與民進黨支持選民的社會及心理分歧，不僅可以了解臺灣民主轉型與競爭性政黨政治萌芽的過程，也可以觀察臺灣解嚴前後政治分歧結構的持續與轉變情形。本文研究發現，國民黨與民進黨的支持選民羣體中，持續而且顯著的主要分歧乃是省籍與民主政治價值的差異。這發現有助於我們了解，為什麼國民黨與民進黨在解嚴前後的政爭焦點，都與省籍情結及民主改革糾葛具有密不可分的关系。

- 一、導論
- 二、政黨、選舉與政治分歧
- 三、解嚴前後國民黨與民進黨的社會及心理基礎
- 四、政治分歧結構的持續與改變
- 五、一個暫時的結論

* 本文原稿曾於民國82年6月11日，在中央研究院民族學研究所行為研究組所舉辦的「民主化與政黨競爭：何以國民黨繼續執政」小型專題研討會中宣讀，並承蒙論文評論人陳德禹教授提供寶貴的修正意見、同時也受惠於林水波、張茂桂、蔡啓濟等教授在討論時所提出的問題，特在此一併致謝。本文刊登之前，受惠於兩位匿名審查人的批評與提供寶貴的修改意見，修改後雖沒有改變討論主題，但已和原稿的風貌相去甚遠，因此特以註明、並對兩位審查人表示深深的謝意。錯誤也許在所難免，責任完全在於作者本人。

** 中央研究院中山人文社會科學研究所副研究員

一、導論

自1980年代以來，臺灣的政治在反對勢力的成長與挑戰之下，從戒嚴時期的一黨威權統治，逐步轉變到戒嚴令的解除、黨禁的開放、中央民意代表的全面改選、及一個競爭性政黨政治雛形初現的民主轉型時期。這段期間也是全球性政治民主化趨勢最為凸顯的階段；亞洲的韓國與菲律賓、南歐的西班牙與希臘、以及中南美洲與東歐的許多威權統治的政體也紛紛瓦解，代之而起的則是一個推動政治自由化與民主改革的新政府。尤其在1988年與1990年之間，當蘇聯共產政權垮臺後，這種政治民主化的趨勢更達到一個前所未有的高峯。蘇聯解體後的俄羅斯及其他獨立國協的加盟共和國，也紛紛繼東歐各國從共產集權走向民主化的步調，開始舉行全民大選以逐步實現經濟自由化與政治民主化的改革。這種全球性的政治民主化趨勢，不僅是Lucian W. Pye(1990)在就任美國政治學會會長演說中所指出的，自二次大戰結束來全球普遍出現「威權主義危機」的一個「大轉型」，同時也是Samuel P. Huntington(1991)所謂的全球性「第三波的民主化潮流」。

不論政治民主化是源自於從上而下所主導的因應改革，抑或由下而上所推動的革命性變遷，在威權主義普遍出現危機及第三波民主化潮流的衝擊之下，威權統治國家的執政黨，都紛紛在民主改革的選舉中失敗下臺，而開啓了民主轉型的大門。然而，臺灣的國民黨卻是極少數的一個例外：在宣布解除戒嚴令與開放黨禁之後，國民黨在「終身職」中央民意代表全面退職後的全國性大選(第二屆國代與立委選舉)中，仍然能夠勝選而繼續執政。作為一個威權統治的國民黨，不僅能在民主轉型的選舉競爭中，繼續獲得絕大多數選民的支持，而且也能順應民主憲政改革的要求，進一步主導修憲的工程。姑且不論憲政改革與修憲的成敗如何，國民黨並沒有在要求民主改革聲浪高漲的選舉中喪失執政的多數地位，這與臺灣的經濟奇蹟一樣，乃是比較政治研究上值得探索的一個主題。

將臺灣的政治民主化經驗與其他民主轉型的國家作跨國比較，以尋求不同結果的肇因時，當然我們必須同時考慮到許多無法控制的內外種種時空

與文化因素。例如：臺灣的民主轉型，發生在經濟仍然高度成長的過程中，不同於其他威權政體因面臨經濟蕭條或政治衝突的憲政危機而解體之情形；臺灣的政治民主化過程，夾雜著臺海兩岸主權的競爭與中共的武力威脅，與其他軍事威權政體所面臨「軍人或文人」統治的選擇，也不能相提並論。雖然本文所處理的主題，旨不在於從事跨國的比較分析，但指出臺灣與其他民主轉型國家在政治、經濟與社會等總體面的不同背景，不僅可以說明臺灣民主轉型的特殊性，同時也有助於了解臺灣政治民主化所以發生的大環境。

基本上，臺灣的民主轉型，開始出現在經濟持續成長與安定的1980年代中期，從戒嚴的一黨威權統治、到戒嚴令的解除、黨禁的開放、以至於競爭性政黨政治的出現。的確，在長久的戒嚴體制下、國民黨一黨威權的「訓政統治」及所造成的種種影響結果，例如：壟斷絕大部分的政治、經濟及社會的資源、壓制反對勢力的抬頭、控制正式的政治社會化管道與教化內容等，即可構成爲解釋國民黨所以能在民主轉型的選舉競爭中，繼續維持多數統治地位的主要原因。進一步言，一方面國民黨在過去三十多年的戒嚴威權統治時期中，創造了高度成長與均富的經濟奇蹟與推動社會現代化的成就，多少已經緩和了威權統治與「法統」逐漸喪失所引起的「統治正當性」危機；另一方面，在全球性威權主義危機普遍出現之際，國民黨的領導菁英適時地宣布解除戒嚴令的結果，不僅能夠繼續主導臺灣的民主轉型外，也免除了抗拒政治民主化潮流所必須付出的可能代價。

在「終身職」中央民意代表全面退職後，國民黨在國會的多數地位勢必重新面臨選民的考驗。然而在第二屆國大代表與立法委員的全國性大選中，國民黨仍然能夠獲得多數選民的支持而執政地位。這一方面不僅說明國民黨在長久戒嚴統治下所壟斷的政治、經濟及社會資源，並沒有因戒嚴的解除及反對勢力的組織化挑戰，而驟然喪失長久來的優勢主導地位；另一方面也顯示民進黨作爲臺灣社會第一個有選民基礎而具實質意義的反對黨，在民主轉型初期的選舉中，與長期主控臺灣政局的國民黨從事選舉競爭，無論在選民動員與政治資源分配上，仍處於不利地位。本文以下的分析，就是從解嚴前

後選民的黨派投票行爲，來看國民黨與民進黨勢力的消長，並從「政黨與選民」的關係來分析政黨競爭與臺灣政治分歧結構的改變。

從分析政黨與選民之間的關係，以及政黨所代表與動員的政治分歧基礎，一方面固然可以了解臺灣民主轉型與競爭性政黨政治萌芽的過程；另一方面也可藉以觀察臺灣解嚴前後政治分歧結構的持續與轉變情形。透過這樣的探討，對於爲什麼國民黨作爲一個威權統治的執政黨，能在民主轉型過程中維持主導的統治地位之問題，或許可以提供一個個體層次的解釋觀點。

二、政黨、選舉與政治分歧

若以 Giovanni Sartori(1976: 64) 所採取的簡單定義來看，現代的政黨不外是「一個在選舉中出現、能夠推出候選人競選公職、與通過選舉考驗的政治團體。」本文採這種定義來看政黨，因爲這樣的說法至少有兩個分析上的優點：首先，本文不必因爲「人民團體法」立法實施以後，出現六、七十個以上登記爲合法政黨所產生分析上取捨的困擾；截至目前爲止，事實上能通過選舉考驗而具有實質意義的政黨，僅有國民黨與民進黨等兩個政治團體而已。其次，從西方民主政治的發展與政黨出現的角度而言，政黨政治的制度化過程與選舉權的擴大，是相互相成、攜手並進的歷史過程，上述政黨的定義也明確地肯定現代政黨與選舉的依從關係。換言之，沒有實質意義的選舉，也就沒有一個現代意義的政黨可言；肯定一個政黨必須通過選舉考驗才能存在，即在於強調「大眾政黨」與「選舉政黨」的意義。從這樣的定義中，那些徒具虛名而無選民基礎的政黨，固然可以略而不論；然而一個具有競爭能力的政黨，不僅必須能夠扮演社會中不同利益匯集與表達的政治接環功能，同時還要有能力推出候選人競選公職並通過選舉的考驗。

社會中的不同利益，不外源自於社會的發展與分工所造成種種人口上與社會屬性上的區分。這些人口上與社會結構或屬性上的區分，如：社會階級、族羣、宗教、地域、文化或價值觀念等客觀上的差異，假定具有「社會關係終界的一種形式」之特性時，則被視爲是「社會分歧」(social cleavage)(Bartolini

& Mair, 1990: 216-18)。這種人口上與社會屬性上的特徵，若與一個政治團體或政黨形成密切的關係，則被看成為「政治分歧 (political cleavage)」(Powell, 1976: 2)。換言之，政治分歧也就是社會分歧的政治面意義，政治分歧同時也建立在種種人口、社會及文化價值等區分的不同政治利益基礎上。¹基本上，政黨乃是匯集與表達不同政治利益的團體，亦即政黨是社會中不同政治分歧與利益加以具體化、制度化而形成的一種政治團體。

在西方政黨政治的發展史上，現代政黨的出現大致上可說始於19世紀末葉，²這段期間也是西歐在經歷民族革命與工業革命後，各種社會運動起與選舉權擴大的時期。一個政黨的發展過程，或許如Samuel P. Huntington(1968: 412-33)所說的，可以分為「派系主義」、「社會勢力與政治分歧的兩極化」、「政治參與的擴大」、而到「政黨的建制化」等四個必需的階段。但在不同的社會中，影響政黨形成的因素、以及影響因素的相對重要性等，也不盡然相同。Seymour M. Lipset 和Stein Rokkan(1967)在分析西歐政黨體系的形成時，則強調民族革命與工業革命所導致相繼出現的政治分歧、及後來選舉權擴大的時機等，如何「定型化」(freezing)西歐政黨制度。從Lipset和Rokkan的分析中，大致上可以看到西歐政黨的發展軌跡，亦即：西歐民主社會在民族革命的建國與工業化革命的經濟發展過程中，不僅相繼出現「中心/邊陲」與「國家/教會」、「地主/工業家」與「所有者/工人」等四種主要的政治分歧，同時也導致相對應爭取不同團體利益之各種政治與社會運動的勃興。隨著後來國家的動員與選舉權的擴大，這些政治分歧的結構也逐漸轉化，而反應到不同政黨之上。20世紀初，當西歐民主國家紛紛擴大選舉權時，由於「所有者/工人」的階級分歧及相應的社會運動最為凸顯，也因此形成20世紀初期西歐政黨組合聯盟的軸心。Lipset和Rokkan認為西歐60年代的政黨競爭體系，基本上乃是在20世紀初期的20年代，由於不同政治分歧互為影響並藉著投票權擴大的時候，而獲得「定型」的制度化結果。

以Lipset與Rokkan「分歧與定型」的分析架構，來看政黨政治在臺灣

的發展，則可以發現：國民黨與民進黨的選舉競爭，乃是延續戒嚴解除以前國民黨與非國民黨籍候選人，在各層級選舉競爭中得票率的消長。這種得票率消長背後所代表的政治分歧，在解嚴前後民主轉型的政治動員過程中，逐漸整合而「定型」成爲了國民黨與民進黨等兩黨主導的格局。換言之，臺灣現代政黨的出現，乃是民進黨成立(1986年)與戒嚴令解除(1987年)以後的新發展，而戒嚴時期與經濟發展過程中所衍生的政治分歧，則在中央民意代表全面改選與臺灣公民選舉權擴大之民主化過程中，逐漸「定型化」而形成國民黨與民進黨的兩黨競爭模式。在「國民黨/民進黨」兩黨競爭格局形成之前，也出現過「國民黨/無黨籍」與「國民黨/黨外」的選舉競爭階段。

1. 國民黨與無黨籍的選舉競爭時期：1950至1969年

從臺灣的政治史來看，在國民政府遷臺之際，臺灣社會已經歷了1947年的二二八事件。二二八事件的發生，不僅多數地方的主要政治菁英遭受殺害，同時也導致省籍分歧的出現，接著1948年戒嚴令的實施，更限定了臺灣民衆的政治參與的權利。然而，1949年開始的一連串土地改革，不僅逐步消除地主階級、剷除地方勢力與改善農村生活外，同時國民黨也贏得地方的支持，並透過建立「準」政府組織的水利會、農會等自治團體，而將政黨的勢力深植於民間。換言之，自1949年以後，國民黨在臺灣所實行的乃是名幅其實的一黨威權統治；隨國民政府遷臺的「中國青年黨」與「中國社會民主黨」，自政府在1950年開始辦理地方自治選舉而擴大政治參與之後，也逐漸通不過選舉的考驗，而演變爲有名無實的陪襯在野黨而已。所以，在1969年中央民意代表補選以前，不僅「地主/佃農」的分歧已經逐漸消失，或被納進國民黨所掌控的「分而治之」的地方派系競爭中，而省籍的分歧在戒嚴的威權體制下，則表現於公部門與私部門的職業區隔上。基本上，自1950年至1969年之間的選舉，可說是國民黨所主導的一種「國民黨/非國民黨(無黨籍)」的選舉競爭形式。從表一臺灣省議會選舉與表二臺北市議會選舉的政黨得票率來看，大致上也顯示早期的選舉，乃是國民黨與非國民黨的無黨籍候選人競爭的一種選舉。(當然，其中不乏候選人以「青年黨」或「民社黨」

表一：臺灣省議會選舉的政黨得票率，1954-89

	國民黨 %	(黨外) / 民進黨 %	無黨籍 / 其他 %
1954 年	72	--	28
1957 年	69	--	31
1960 年	66	--	34
1963 年	72	--	28
1968 年	77	--	23
1972 年	71	--	29
1977 年	65	(18)	17
1981 年	72	(16)	12
1985 年	71	(19)	11
1989 年	64	26	9

資料來源：由臺灣省選委會與內政部中央選委會的選舉實錄中加以計算得出。

表二：臺北市議會選舉的政黨得票率，1968-89

	國民黨 %	(黨外) / 民進黨 %	無黨籍 / 其他 %
1968 年	85	--	15
1974 年	84	--	16
1977 年	76	--	24
1981 年	69	(16)	15
1985 年	62	(22)	16
1989 年	69	24	7

資料來源：同表一。

之名義從事競選。)

2. 國民黨與「黨外」的選舉競爭時期：1969至1986年

1969年中央民意代表的補選，毫無疑問地是另一次選舉權的擴大。從1972年的增額代表定期改選以後，選民選舉參與的範圍由地方而中央。然而在工業化加速、經濟成長與社會現代化也逐漸顯現具體成果的時，臺灣也

因外交上的挫敗而在國際社會上日漸孤立。雖然自1971年中華民國退出聯合國以後，國民黨也開始積極推行「本土化」的政策，但國民黨一黨威權統治的「正當性」，則在中央民意代表機構逐漸老化凋零的情況下，愈來愈受到社會大眾所質疑。此後，不僅外交的挫敗與國民黨的戒嚴統治成爲全國性的政治議題，而工業化、都市化與經濟快速發展的現代化變遷，也帶來種種全國性的政治及社會問題。中央層級的民意代表增補選舉的實施，不僅有助於無黨籍反對人士逐漸走出地方主義的格局，同時透過全國性的選舉，零星分散的反對異議人士，也在特定而具有動員作用的全國性政治分歧議題(如反特權、反貪污、政治制衡等等)上互相聲援，而逐漸聯盟形成所謂「黨外」的準政治團體，以別於其他無黨籍的參選人(黃德福，1992)。因此，在這期間的選舉競爭，也形成了「國民黨/黨外」對立的競選模式。從表一、表二與表三的政黨得票率變化來看，在無黨籍候選人逐漸形成可以辨識的「黨外」準政黨組織以後，雖然國民黨的得票率並沒有受到嚴重影響而顯著下降，但「黨外」已經逐漸取代「無黨籍」而成爲國民黨以外選民投票的選項，並爲後來民進黨的組成奠下基礎。

3. 國民黨與民進黨的選舉競爭時期：1986年以後

「黨外」在經過「美麗島雜誌社」、「黨外公共政策研究會」等組織化階段後，而在1986年9月28日宣布組成「民主進步黨」。1991年底「終身職」中央民意代表全面退職以後，第二屆國大代表與立法委員的選舉，可說是一種選舉權實質意義上的擴大；換言之，選民的黨派投票的集體結果，必然會轉化成爲政黨在國民大會或立法院總席次的權力分配上，而不再只是反應少數「增額席次」的變化而已。戒嚴時期所壓制或醞釀的議題、經濟發展過程所衍生的政治分歧，以及在解嚴後民主轉型過程中各種社會運動出現所主張的訴求等，在這種中央民意代表全面改選的奠基性選舉時，也逐漸「定型」而成爲國民黨與民進黨兩黨競爭的選民組合。表三的得票率分配不外於顯示，從1986年以至於1992年的第二屆立委選舉止，民進黨逐漸獲得選民的認可與支持，國民黨則受到民進黨的挑戰而逐漸流失選票。從民進

表三：中央民意代表區域選舉的政黨得票率，1972-92

	國民黨 %	(黨外) / 民進黨 %	無黨籍 / 其他 %
增額立委選舉			
1972 年	74	--	26
1975 年	79	--	21
1980 年	76	(8)	18
1983 年	73	(17)	10
1986 年	69	22	8
1989 年	61	28	11
第二屆國代			
1991 年	72	23	5
第二屆立委			
1992 年	60	32	8

資料來源：同表一。

黨的組織化發展而言，在這段解嚴後的民主轉型過程中，民進黨也逐漸完成Huntington(1968)所指出的派系主義、社會勢力與政治分歧的兩極化、政治參與的擴大、及政黨建制化等政黨發展的四個階段。因此，在政治參與擴大有重大意義的第二屆國代與立委選舉時期，可能的政治分歧表現在選舉競爭上，則形成了「國民黨與民進黨」兩黨對立的選舉競爭體系。

Lipset 與 Rokkan 關於政黨形成的「分歧與定型」理論，對解釋西歐政黨體系的出現與穩定，的確具有相當大的說服力。他們的論點不僅指出政治分歧的出現與顯著性，決定了西歐政黨的組合與勢力消長，同時也說明政黨競爭的體系，在獲得「定型」之後具有穩定發展的特性，即：一個能推出候選人而且通過選舉考驗的新興政黨不但不容易出現，而既已存在的政黨也不太可能發生驟亡的現象。從表一、表二與表三中，我們也可以發現反對勢力在不同階段的政黨組合(黨外或民進黨)形成後，得票率逐漸升高，而無黨籍候選人的總得票率卻相對大幅減少。這也說明支持非國民黨籍或其他政黨候選人的選民，逐漸以具有組織化的「黨外」或民進黨為投票支持的對象。大

體上國民黨的得票率，雖然並沒有因為反對勢力的組織化、形成一個具有競爭能力的政黨而銳減，但卻具有一種逐漸下降的變化趨勢。如表三的資料所示，國民黨總得票率的減少趨勢，尤以戒嚴解除前後的立法委員選舉為最明顯。假定第二屆國代與立委的選舉，是一種足以將政黨競爭形式「定型化」的選舉，則從表三的資料中可以顯示，國民黨與民進黨的兩黨競爭體系已經逐漸形成。由此看來，似乎也可以預見這種政黨競爭的形式仍然會繼續出現在未來的選舉中，除非有其他的重大分割性政治分歧出現而無法在現存的兩大政黨中找到出路，否則能通過選舉考驗的強有力第三黨出現可能性也就相對降低。

從「分歧與定型」的理論中，Lipset 與 Rokkan 也指出愈早獲得制度化的政黨，在以後的選舉競爭愈居於有利地位。隨著臺灣的光復國民黨早已經在臺灣發展，何況在戒嚴統治之下，早期的臺灣社會除了省籍的分歧比較嚴重之外，並沒有一個持續而具分裂作用的政治分歧存在，足以讓在野的反對勢力具有大量動員的基礎。一方面土地改革的成功不僅「反動員」(de-mobilize)廣大的佃農階級，也剷除了反對的地方士紳，而輸誠合作的地方菁英則納入地方派系的輪流分治的體系中；另一方面比較嚴重的省籍分歧，也在「本土化」的政策下被沖淡，或引散到公私部門的職業區隔上。換言之，在國民黨所掌控與主導的臺灣民衆政治參與權擴大之際，這種政治參與權擴大與動員所導致的政黨組合可能性，不僅表現在國民黨的「臺灣化與本土化」趨勢上，亦即國民黨員中本省籍比率逐漸增加；同時也顯示在國民黨由「革命性格」轉變到「選舉性格」的調整上。這些轉變不但迫使長久來習於威權統治的國民黨必須繼續辦理選舉，以化解法統日漸消失所引起的統治正當性危機，而事實上國民黨藉著地方派系的運作，也能在各層級的選舉中獲得絕大多數選民的支持而勝選。固然由於國民黨能夠一直維持選舉的勝利，才可能在面臨民進黨組黨而挑戰戒嚴令之際，選擇解除戒嚴令而非採取鎮壓的手段來因應。這些因選舉權擴大所導致的政治分歧，無論是逐漸形成相互交割而消匿，或被動員支持反對勢力以促成一個組織化反對黨的出現，基本上可說都是在國民

黨威權統治之下所完成與主導的一種控制變遷。正如Adam Przeworski(1986: 60)所指出的：「一個和平的民主轉型要成為可能，首要解決的問題，即在如何將轉型的不確定加以制度化，而其結果不會威脅到具有能力扭轉這種轉型過程者的利益。」雖然國民黨具有能力扭轉可能的政治變遷結果，但國民黨仍然看到了臺灣選舉的正面功能，至少在短期內還不能威脅到它的統治地位。的確，定期選舉不但是國民黨與民進黨都能夠接受，而且雙方也都相信有勝選把握的一種規範競爭性政治過程之制度；同時藉著選舉的繼續與擴大而成就了臺灣的政治、從戒嚴威權統治進入一個民主轉型的階段。

三、解嚴前後國民黨與民進黨的社會及心理基礎

政黨競爭體系的「定型」，不僅指政治分歧獲得制度化，同時也說明利益不同的選民羣體在政治分歧的制度化過程中逐漸形成政黨組合，即選民逐漸對所支持的政黨形成穩定的政黨效忠或政黨認同。這種政黨效忠與政黨認同，就構成了政黨與選民的心理橋樑，也成為選民慣常性投票的主要依據。社會中存在的各種社會分歧，雖然是政黨所賴於形成的社會基礎，但在經驗的研究上，我們透過選民的黨派投票行為，去觀察政黨所代表的政治分歧。以下，我們以解嚴前後幾次針對選民投票行為而執行的大規模全省性抽樣調查資料，³來分析選民的政黨偏好與投票行為，並從影響選民黨派投票的決定因素中，進一步檢視臺灣社會的政治分歧結構。

從解嚴前後政治民主轉型過程中、選民的「政黨偏好」的穩定與變化上，⁴我們可以觀察到國民黨與民進黨兩黨競爭格局的「定型」效果。由表一、表二與表三的政黨得票率中，可以發現選民黨派投票的集體結果，雖然呈現出一種改變的趨勢，但變化的幅度並不大。這在於說明解嚴前後，國民黨與民進黨的勢力消長具有穩定性。投票行為研究的一般發現，都肯定選民的黨派投票行為與他們對政黨的心理傾向之間，具有密切影響的關係，而政黨偏好的改變也關係著選民黨派投票行為。從表四關於選民政黨偏好的變化中(見附錄一的相關測量題)，一方面可以發現在解除戒嚴令以前的1983年，

選民對「黨外」表示偏好的比率雖然不高，但1986年9月民進黨組成以後，選民對民進黨表示偏好的比率卻有穩定增加的趨勢。這種改變可以說明選舉競爭中的反對勢力，一旦獲得制度化的發展，不僅會以政黨的組織形式出現在選舉舞臺，同時在選民心中也自然形成一個可以認同或偏好的對象；另一方面我們也發現，對兩黨沒有偏好的中立選民，比率有逐漸降低的趨勢，顯示出解嚴前後的民主轉型過程中，選民逐漸具有政黨的心理傾向，亦即選民逐漸具有「黨派性」與「政黨組合」的變化趨勢。其中，選民偏好國民黨的比率雖然有起伏（也有可能是樣本誤差所導致），但並沒有明顯降低的變化；但相對地而言，民進黨獲得選民對它表示偏好的比率，則具有逐漸增加的趨勢。

表四：選民的政黨偏好與改變，1983 - 1992

	1983	1986	1989	1992
	%	%	%	%
國民黨	38.4	44.6	38.5	40.3
其他*	54.6	47.2	48.9	44.0
(黨外) / 民進黨	(7.0)	8.2	12.6	15.7
有效樣本數(N)	1647	1359	1301	1389

*：「其他」一類包括「不知道」、「沒有偏好」及「無所謂喜不喜歡」等。

臺灣的民主轉型，從戒嚴的解除、黨禁的開放、到「終身職」中央民意代表的全面退職與改選等，毫無疑問地與反對勢力從「黨外」到民進黨組成的制度化過程，具有密不可分的影響關係(黃德福，1992)。在解嚴前後朝野政治勢力相激相盪的影響過程中，推動民進黨與國民黨朝著政治民主化方向發展的力量，若落實在選民的政治心理層面來加以觀察，則不外是一種要求

民主改革行動背後的「民主價值與信念」。的確，在一個強調威權文化的儒家社會中，支持選舉與政黨競爭等民主制度底層的政治信念，乃是由西方輸入而習得的一種民主的政治價值。臺灣社會在工業進一步深化、經濟持續發展與社會快速現代化，而逐漸步入已開發國家之林的發展過程上，選民透過直接或間接的方式、有意或無形之中，也逐漸內化與習得相關的民主價值(胡佛與徐火炎，1983；胡佛，1985；袁頌西與陳德禹，1988)。進一步來看，臺灣1950年代以來所實施的定期選舉，不但提供選民一個吸收民主政治價值的場所，同時選舉競爭的過程本身，更是民主價值具體化的一種實踐。從表五選民對自由權、多元權與制衡權等測量題目具有正值取向(即具有民主價值取向)的分佈與變化中，我們也可以發現，從戒嚴以前的1983年至解嚴後的1992年之間，民主價值取向具有逐漸增強的改變趨勢，亦即：整體而言，具有民主價值取向的選民，有愈來愈多的增加趨勢。由表五民主政治價值的增強改變來看，我們同時也可以合理推測：解嚴前後的政治自由化發展與民主轉型，必然與強調自由權、多元權與制衡權的選民比率逐漸增加，具有互相成的影響關係(徐火炎，1991)。

表五：選民羣體中民主價值取向的改變，1983 - 1992

	1983 (A) %	1986 (B) %	1989 (C) %	1992 (D) %	改變 (D-A) %
自由權					
(1) 大家的思想如不一致，社會就會紛亂。	24	37	43	38	+14
(2) 一種意見能否在社會流傳，應由政府決定。	44	62	62	74	+30
多元權					
(3) 在一個地方(社區)上，如果東一個團體，西一個團體，就會雜亂紛擾，影響到地方的秩序與和諧。	26	40	45	59	+29
(4) 一個國家如果政黨太多，會導致政治混亂。	25	36	40	58	+33
制衡權					
(5) 政府如果時常受到議會的牽制，就不可能有大作爲了。	40	56	48	60	+20
(6) 法官在審判影響治安重大的案件時，應該接受行政機關的意見。	54	67	67	76	+24

註：表中數值為有效樣本中，具有「民主價值取向」人數的百分比。

在政治變遷過程上，一旦政治的結構(尤其是關於利益匯集與表達的政黨體制)，無法與經濟富裕及社會現代化的發展程度作同步的調整時，代表不同利益與價值的政治分歧與衝突，也就會浮現與具體化。從表五中，我們大至上也可以看到，解嚴前後的政治轉型過程中，民主信念的增強與威權價值之間的衝突，也會逐漸凸顯而激化。1986年9月28日，當民進黨驟然宣布組黨而對戒嚴體制構成直接挑戰之際，國民黨領導菁英所以能容忍而沒有採取嚴厲的壓制，與愈來愈多的選民大眾具有民主的價值信念，而樂見一個組織化反對黨的出現，無不具密切的關係。換言之，在臺灣民主轉型的過程中，一個重要而顯著的政治分歧，不外是「民主/威權」價值為基礎的一種分歧。在以往的相關研究上，我們也發現選民的政治價值分歧與選舉的黨派投票行為，具有密切的影響關係，亦即：民主價值取向比較強烈的選民，比較傾向於投票支持「黨外」或民進黨的候選人(徐火炎，1991，1992及1993)。這種現象不外說明，在解嚴前後民主轉型期的選舉投票過程中，「民主/威權」的價值分歧，已具體化表現在選民對國民黨或民進黨的黨派抉擇的投票行為上，同時，選民黨派投票的集體結果，也形成了這兩黨的政黨組合作用。

上述分析中，首先我們發現選民逐漸具有「政黨偏好」的心理傾向，亦即具有「黨派性」或「政黨組合」的趨勢；此外，選民對民進黨表示偏好的比率，也具有逐漸增加的變化。其次，在過去的相關研究上，如表五的結果所顯示，不僅發現選民的民主價值取向，具有逐漸增強的改變趨勢，同時也證實民主政治的價值取向乃是構成為影響選民黨派投票抉擇的主要因素之一。以下，我們透過分析影響選民黨派投票抉擇的因素，來確認國民黨與民進黨所代表的政治分歧所在。在過去的投票行為研究上，我們發現從1983年、1986年、1989年的立委選舉，以及1991年的國大代表選舉中，影響選民黨派投票抉擇的共通而且具顯著作用的決定因素，主要是選民的省籍、民主價值取向、政黨偏好(或政黨形象、政黨認同)等變項，而選民其他的差異，如個人、人口上及社會屬性的特徵，雖然在個別不同的選舉中，也許會具有顯著的影響作用，但基本上並沒有一致而持續的顯著影響效果(徐火

炎，1991，1992及1993)。這種研究發現在於顯示，國民黨與民進黨所代表的政治分歧，並不是建立在選民的個人、人口上及社會屬性的特徵區分上，亦即：支持國民黨與民進黨的選民羣體，除了在省籍、民主價值與對政黨偏好的心理取向上具有顯著的差異之外，在其他客觀特徵上的區分並沒有太大的差別。以下，我們僅就統計上具有顯著影響作用的因素，來分析國民黨與民進黨所代表的政治分歧。⁵

從表六的分析結果中可以發現：第一，選民的省籍差異、民主價值取向及政黨偏好等因素，乃是跨越不同選舉而對選民的黨派投票抉擇、具有一致性顯著影響效果的變項；這三個解釋選民黨派投票抉擇的變項，總共可以預測選民所以投票給國民黨或民進黨的準確比率，均高達80%以上。第二，省籍的差異除了在1986年的立委選舉，影響黨派投票抉擇的幅度比較小，亦即本省籍的選民比外省籍的選民去投民進黨的可能性要大將近3倍之外；在1983年的立委選舉時，本省籍投票支持民進黨的可能性，則高達外省籍選民的6倍左右，在1989年的立委選舉中，也達到4倍強；而在1992年的立委選舉時，這種省籍的差異表現在支持民進黨的投票上，更高達8.6倍之多。第三，民主價值取向比較強烈的選民，較傾向於投票支持民進黨；選民在民主價值取向上一個測量單位的增加變化，投票支持民進黨的可能性，則會增加1.5至2倍左右。第四，從表六的分析結果中，我們也可以發現：較傾向於偏好民進黨的選民，也比較可能投票支持民進黨，而選民在政黨偏好一個測量單位的增加變化，投票給民進黨候選人的可能性，則會增加2倍至2.5倍；尤其是在1992年的立委選舉投票中，選民在政黨偏好上一個測量單位的增加變化傾向於偏好民進黨，投票支持民進黨的可能性，則會增加高達5倍之多。

就選民黨派投票的集體選舉結果而言，政黨的得票率與席位的變化，不外在於反應政黨組合的趨勢與政黨勢力的消長。然而就個體層次來看，選民黨派投票的長遠影響，則在於顯示選民逐漸對所支持的政黨形成穩定的政黨效忠或政黨認同。假定在測量方法上的信度與效度沒有問題，選民的政黨認同心理與黨派投票抉擇行為間，也必然具有密切的影響關係。自密西根大

表六：影響選民黨派投票因素的洛基迴歸分析，1983-92

依變項：	投民進黨票							
	1983		1986		1989		1992	
解釋變項	B	exp(B)	B	exp(B)	B	exp(B)	B	exp(B)
省籍 (本省籍)	1.755	5.783***	1.079	2.941**	1.456	4.288***	2.161	8.676***
民主價值取向 (高)	.452	1.571***	.702	2.018***	.341	1.407***	.271	1.131**
政黨偏好 (民進黨)	.831	2.297***	.918	2.505***	.859	2.361***	1.588	4.895***
常數項	-6.422***		-5.897***		-5.749***		-9.098***	
Chi-square(3)	172.14		285.12		228.88		428.35	
Pseudo R ²	0.2224		0.3336		0.2577		0.3853	
% correctly predicted	85.39		85.92		81.74		83.71	
N	869		824		816		939	

** : p < .01 *** : p < .001

說明：民主價值取向為因素分數，測量題目見附錄二。
 政黨偏好為一至七點的分數。

學發展「政黨認同」概念而應用到選舉研究以來，也一再證實這種影響關係 (Converse & Markus, 1979)。雖然，本文以「政黨偏好」的測量來替代「政黨認同」的測量，但也可以看出選民的政黨偏好，乃是直接影響黨派投票抉擇的顯著因素。從上面表六的分析中，我們將省籍的差異、民主價值取向與政黨偏好，一併來檢視省籍因素與民主價值取向對黨派投票抉擇的淨影響關係，亦即透過統計分析來控制政黨偏好的影響效果，以觀察省籍與民主價值取向的獨立影響作用。分析結果也發現省籍與政治價值的差異本身，即構成爲分割黨派投票的一種政治分歧。省籍與民主價值的分歧，固然造成選民黨派投票抉擇的分野所在，但這兩種的分歧是否也同樣表現在選民對政黨偏好的心理傾向上？換言之，省籍與民主價值差異所指涉的政治分歧，在解嚴前後的民主轉型過程中，既然具體化地表現在黨派投票抉擇上、而構成國民黨與民進黨等兩黨選舉競爭的基礎，則省籍不同的與民主價值取向有別的選民羣體，是否也會逐漸對所支持的政黨形成穩定的政黨偏好心理傾向？

要回答這個問題，我們必須進一步觀察省籍與政治價值的分歧，是否也跨越各次選舉的不同時間點上，而與政黨偏好的心理傾向形成一致且穩定的顯著影響關係。在分析的策略上，我們除了探討省籍、民主價值取向的影響效果外，同時也將以往研究所發現可能影響政黨偏好的變項，如性別、年齡與教育程度等一併納入分析。從表七的分析結果中，首先我們發現省籍與民主價值取向，仍是一貫影響選民政黨偏好的主要顯著因素：本省籍的選民對民進黨的偏好程度，比外省籍的選民顯著爲高；民主價值取向較強烈的選民，對民進黨表示偏好的程度也較高。其次，表七的分析結果也顯示，選民的教育程度也是解嚴前後以來，一直是影響選民政黨偏好的主要顯著因素：教育程度較高的選民對民進黨表示偏好的程度反而較低。這項發現一方面在於說明教育程度較高的選民，可能來自於軍公教等公部門的職業類別爲多，另方面也顯示國民黨長期以來在高中以上校園積極吸收黨員的必然效應。第三，就選民的年齡變項而言，除了在1989年的資料上未達顯著水準外，但整體而言對政黨偏好仍具一致性的顯著淨影響作用：年紀較輕選民的政黨偏

表七：影響政黨偏好因素的迴歸分析，1983-92

依變項：	政黨偏好（民進黨）			
	1983 β	1986 β	1989 β	1992 β
解釋變項：				
省籍（本省籍）	.25	.23	.22	.27
民主價值取向（高）	.15	.30	.27	.27
性別（男）	(.02)	(-.01)	(-.01)	(.02)
年紀（大）	-.18	-.07	(-.04)	-.11
教育程度（高）	-.27	-.23	-.17	-.23
R-Square	.196	.182	.142	.196
N	906	884	870	982

註：表中數字為標準化迴歸係數，除了括符中的值之外，其餘的係數值都達到 .05 以上的統計顯著水準。其中，省籍與性別以虛擬變數處理。

好，較可能傾向於民進黨，而年紀較大的則較傾向於對國民黨表示偏好。的確，年齡反應在政治上的意義不外是「急進與保守」的分野，因此，年輕的選民比較敢於表達對反對黨的支持，而傾向於偏好民進黨；另一方面從政治社會化的角度而言，年紀較大的傾向於偏好國民黨的關係，也同時在於說明國民黨是歷史較長的政黨。至於選民的性別不同，對政黨偏好的影響作用，並未達統計上的顯著性。表七所考慮的解釋變項，數目雖然只有五個，但就總解釋變異量的百分比來看，大致上達到有效解釋的15%至19%左右；可見這些少數具有顯著影響作用的解釋變項，對了解選民政黨偏好的差異具有重要的貢獻。

表七中，我們將性別、年紀與教育程度等變項，一併考慮進來進行迴歸分析，主要目的在於觀察省籍、民主價值取向等變項的相對淨影響效果。就一般的了解，年紀較輕的、或教育程度較高的選民，比較沒有強烈的省籍觀念；同時性別、年紀與教育程度之間也具高度關係，而這些變項也都是影響選民養成民主價值的政治社會化重要的因素。我們一併納入分析的結果，如

表七所顯示，性別、年紀與教育程度等變項，雖然對選民的政黨偏好構成不同程度的顯著影響關係，但並沒有取代省籍、民主政治價值取向等變項、對政黨偏好所產生主要而顯著的影響效果。這也說明省籍及民主價值取向等因素，對選民政黨偏好的顯著影響關係，並非透過性別差異、年紀大小與教育程度高低等不同而所產生的虛假關係。如表七的迴歸分析結果所顯示，省籍與民主價值取向等兩個變項，仍然是決定政黨偏好傾向於國民黨或民進黨的兩個最主要的因素。從表七的結果中，我們也發現與民主價值取向養成具有密切關係的年齡與教育兩個變項，雖然對政黨偏好也具有跨越不同選舉而一致的顯著影響作用，影響效果卻卻與民主價值取向呈相反的方向。換言之，教育程度較高的選民可能傾向於偏好國民黨，但若他是年紀較輕的、或具有較強烈民主價值取向的選民，則可能會改變對民進黨的偏好。這種衝突性的顯著影響作用，表現在決定選民的黨派投票抉擇上，教育程度與年紀等變項僅僅具有間接的影響效果，它們對黨派投票抉擇的直接影響效果，則被選民的民主政治價值取向與政黨偏好所沖淡或取代。根據過去的研究結果所顯示(徐火炎，1991，1992及1993)，若與省籍、民主價值取向、政黨偏好等變項一併納入，作為解釋選民黨派投票抉擇的因素而進行迴歸分析時，選民的性別、年紀與教育程度等變項，對黨派投票抉擇的直接影響效果，就變為不具統計上的顯著性。上述表六所報導的分析結果，也就是刪除性別、年齡與教育程度等、不具直接顯著影響作用的變項，而重新再進行分析的結果。

上述的分析中，我們從影響選民政黨偏好與黨派投票抉擇等因素中，大致上可以看到解嚴前後國民黨與民進黨的選民基礎。無論就政黨偏好的心理傾向或選舉中的黨派投票抉擇而言，選民的省籍與民主價值取向，在跨越不同的各次選舉中，都具有一致而顯著的影響作用。這項研究發現一方面說明國民黨與民進黨所代表的政治利益，在省籍的不同與「民主/威權」的政治價值分歧上，具有顯著而且一致性的差異；另一方面則指出支持國民黨與投票給民進黨的選民羣體之間，在其他人口與社會屬性的區分上，並無顯著的不同。這種發現也指出臺灣的選民，除了省籍與政治價值的分歧，在尋求不同

政黨組織以表達政治利益上，具有分割性外，其他關於人口結構上與社會屬性上的區別，僅僅只是一種交互切割的分歧(cross-cutting cleavages)，亦即：這些不同人口上與社會屬性上的團體成員，並沒有壁壘分明的一致性黨派投票或黨派偏好。根據Lipset(1959/1981: 77-8)的說法，交互切割的分歧或政治團體成員的重疊性，不但有助於政治衝突的緩和，而且也是穩定的民主政治所以成爲可能的重要條件。進一步說，這種交互切割的分歧，多少可以說明在解嚴前後，無論是支持民進黨或國民黨的選民羣體，都不願意看到政治衝突的升高或兩極化的發展。這也鋪陳了和平的民主轉型，所以在臺灣成爲可能的一種基礎。

四、政治分歧結構的持續與改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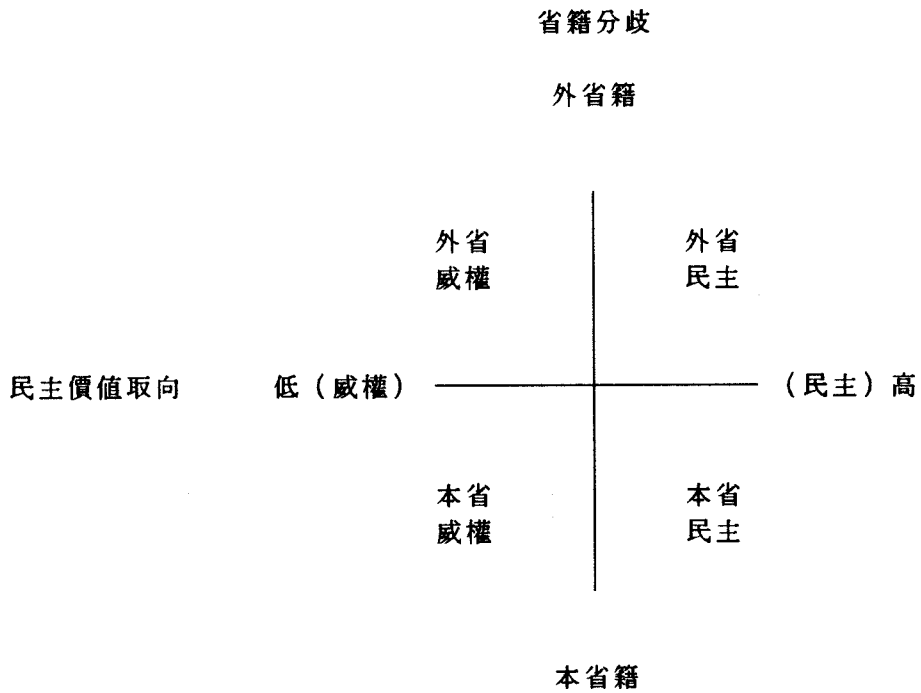
在解嚴前後民主轉型中的各次選舉中，從上面的分析可以顯示，省籍與政治價值的分歧，乃是國民黨與民進黨等兩黨支持選民，在黨派投票抉擇上的主要分野所在。雖然省籍的劃分可以歸咎歷史上「二二八事件」的創傷源，但省籍區別的繼續存在，也是政府戶籍法的政策結果，這不僅與長久形成的公私部門的職業區隔交互增強，而地方以本土化菁英爲主的自治與中央由大陸省籍菁英所壟斷的威權統治之「兩元化政治」，更將逐漸不具社會與文化衝突性的省籍差異，轉化成爲具有政治分歧的一種內涵。大陸省籍的選民對國民黨所形成的認同與慣常性的投票支持，固然可以追溯到國民黨與國民政府的遷臺，同時也是國民黨在戒嚴統治的過程中，積極推行「愛黨(國民黨)即愛國」的政治教化結果。在1970年代以後，政府積極推行「本土化」用人政策，以及國民黨深入社會各個階層與機關組織的事實，國人更普遍相信「加入國民黨乃是參政的主要途徑」；因此在國民黨一貫積極吸收黨員的政策配合下，本省籍的國民黨員人數也一直增加，而高達國民黨總人數之70%左右(Sutter, 1988: 10)。就黨員省籍比率而言，國民黨與民進黨可說都是本省籍的政黨，但就政黨的政治立場與主張而言則南轅北轍，國民黨所訴求的是大中國主義與統一，而民進黨的政治主張，則從「黨外」的「住民自決」到

最近臺灣獨立獨列入黨綱的「獨立」主張。換言之，省籍的政治分歧表現在國民黨與民進黨的黨派支持上，則出現一種不對等的關係，即本省籍的選民可能支持國民黨與民進黨；但外省籍的選民則一貫支持國民黨，除非有例外的因素發生影響作用，否則外省籍選民不太可能傾向於支持民進黨。在這層意義而言，民進黨傾向於被定位為一個本省籍的政黨，而國民黨則被視為本省籍為主卻為外省籍所主導的一個政黨。

政治價值成為政治分歧的基礎，所顯現的意義在於政治上的變與不變之分野。主張加速民主改革的選民，相對於習慣接受威權與安定的選民而言，具有比較強烈的民主價值取向。上述中提到臺灣民主轉型的心理上的主要動力，來自於選民在經濟逐漸富裕與社會現代化的過程中，所習得與內化的民主政治與政黨政治的價值信念，這是經濟發展與社會現代化過程中的一種必然的政治文化與價值的同步變遷。在野勢力從零星分散的異議反對人士、到「黨外」的準政黨組織以迄於1986年的民進黨出現，與這種民主政治文化價值的變遷，不但是平行發展的過程，甚至可說是得力於選民大眾逐漸具有民主政治的價值與信念。以威權統治來發展經濟與安定社會而居功的國民黨，在民衆逐漸具有民主政治價值取向之際，若不能在政治結構的調整上滿足逐漸升高的民主改革要求，仍無法避免威權統治正當性接受挑戰的危機。在解嚴前後，民主價值取向比較強烈的選民，也比較傾向接受與樂於見到民進黨作為一個在野黨的茁壯，成為一個能與國民黨制衡的政治力量，在這樣的情況下臺灣民主的政黨政治也才成為可能。所以，民主政治價值取向比較強烈的選民，在黨派投票抉擇上也傾向於投票支持民進黨。相反的強調安定習於威權統治的選民，則傾向於投票支持國民黨。解嚴前後各次選舉的經驗資料也顯示，政治價值上的分歧，不僅表現在選舉的黨派投票抉擇行為上，同時也構成選民對國民黨與民進黨的政黨偏好之上。

從選民的黨派投票抉擇行為與政黨偏好的心理傾向之中，我們發現省籍與「民主/威權」的政治價值分歧，基本上乃是左右戒嚴前後國民黨與民進黨在選舉競爭勢力消長的兩個政治分歧。為了進一步說明這兩個政治分歧與

政黨勢力消長的關係，我們將省籍分成本省(含本省閩南、本省客家及原住民等)與外省(大陸省籍)兩大類，而將民主價值取向的高低不同，以綜合指標的因素分數之正負(高低)標準分成「民主」與「權威」兩類，如圖一所示，進一步交叉建構成外省威權、外省民主、本省威權與本省民主等、四種分析上的選民羣體類型。從這種類型的比較分析中，進一步來觀察政治分歧的持續與轉變。



圖一：政治分歧與選民類型

從表八選民類型與黨派投票的分析結果中，一方面我們可以很清楚看到省籍分歧表現在政黨投票支持上的一面倒現象，亦即絕大多數的外省籍選民都會投票支持國民黨，而民進黨的票源則主要來自於本省籍的選民羣體；另一方面我們可以看到政治價值分歧的作用，則具有於矯正省籍分歧不均衡性的效果：具有較強烈民主價值取向的外省籍選民羣體，則投票支持民進黨的比率相對會提高一些。在具有強烈民主價值取向的本省籍選民羣體中，投票支

表八：選民類型與黨派投票，1983-92

	投國民黨 %	投黨外/民進黨 %	總人數
1983年立委選舉			
外省威權選民	99.1	.9	116
外省民主選民	94.4	5.6	67
本省威權選民	85.6	14.4	392
本省民主選民	73.1	26.9	294
	Eta = .243 (p<.001)		
1986年立委選舉			
外省威權選民	100.0	0.0	60
外省民主選民	90.1	9.9	71
本省威權選民	86.5	13.5	381
本省民主選民	62.1	37.9	312
	Eta = .323 (p<.001)		
1989年立委選舉			
外省威權選民	96.1	3.9	80
外省民主選民	94.0	6.0	64
本省威權選民	79.8	20.2	338
本省民主選民	65.4	34.6	334
	Eta = .256 (p<.001)		
1992年立委選舉			
外省威權選民	100.0	0.0	88
外省民主選民	95.8	4.2	72
本省威權選民	76.9	23.1	407
本省民主選民	55.6	44.4	372
	Eta = .341 (p<.001)		

持民進黨的人數比率最高，從1983年選舉「黨外」階段的27%，至民進黨出現的1986年籍以後的各次選舉，投票支持率增加到35%以上，而在1992年第二屆立委選舉時，本省籍具有民主價值取向的選民中，高達44.4%的比率投票支持民進黨。這四類選民羣體的政黨偏好，如表九的所顯示，也呈現出類似的結果。以外省籍威權取向的選民為最偏向於國民黨，其次是外省籍民主取向的選民，而最可能偏向於民進黨的，則為本省籍而且具有民主價值取向的選民。我們從省籍與政治價值的兩個政治分歧來將選民分類，進而分析不同類型選民的黨派投票抉擇，也發現這四種不同類型選民在解嚴前後的歷次選舉中，不僅在黨派投票抉擇行為上而且在政黨偏好的心理傾向上，均具有一致而顯著的差異性存在(Eta值均達統計上的顯著水準)。

從這資料的分析中，我們發現國民黨與民進黨在解嚴前後的各次選舉中，分別在這四類選民羣體中的勢力消長：第一，在外省籍威權取向的選民中，國民黨的得票率平均為98%強，而民進黨平均為2%弱；第二，在外省籍民主取向的選民中，國民黨的得票率平均為94%弱，而民進黨平均為6%強；第三，在本省籍威權取向的選民中，國民黨的得票率平均為84%弱，而民進黨平均為18%弱；最後，在本省籍民主取向的選民中，國民黨的得票率降為平均為64%，而民進黨則高達平均為36%左右。從這樣的研究發現中，一方面可以說明客觀上的省籍區分，自政府遷臺以來一直都存在，而這種客觀上的省籍劃分(本文所用的籍貫分類)，事實上仍然持續構成國民黨與民進黨兩黨支持選民所以不同的基礎；另方面則指出解嚴前後選民已經逐漸具有民主政治的價值取向，這不僅推動臺灣政治民主化的一種動力，同時這種政治價值的分歧，也是民進黨所以能夠挑戰國民黨威權統治的憑藉。自民進黨組成以後，在中央民意代表選舉上得票率的提高，與選民逐漸具有民主價值取向的增強改變，形成同步化的平行變遷趨勢；同時，選民的民主價值取向，或多或少也會沖淡省籍分歧表現在黨派投票抉擇上的不均衡性。在臺灣社會逐漸現代化而步入以開發國家之林時，隨著政治民主化發展與競爭性政黨政治的鞏固，這種政治價值必然也會從戒嚴前後的「威權/民主」分歧的

表九：選民類型與政黨偏好，1983-92

政黨偏好（偏民進黨，七分點測量）			
	Mean	SD	N
1983年立委選舉			
外省威權選民	2.181	1.478	116
外省民主選民	2.299	1.488	67
本省威權選民	3.401	1.346	392
本省民主選民	3.640	1.194	294
Eta = .373 (p<.001)			
1986年立委選舉			
外省威權選民	1.967	.974	60
外省民主選民	2.465	1.205	71
本省威權選民	3.165	1.346	381
本省民主選民	3.782	1.546	312
Eta = .358 (p<.001)			
1989年立委選舉			
外省威權選民	2.150	1.294	80
外省民主選民	2.563	1.379	64
本省威權選民	3.163	1.470	338
本省民主選民	3.755	1.613	334
Eta = .323 (p<.001)			
1992年立委選舉			
外省威權選民	2.253	1.017	89
外省民主選民	2.660	1.072	75
本省威權選民	3.340	1.176	427
本省民主選民	3.930	1.323	396
Eta = .388 (p<.001)			

衝突，逐漸轉變到以「民主」為主導的衆趨價值，甚至於形成一個新的民主政治文化。

五、一個暫時的結論

從臺灣社會近30年來的現代化歷程來看，國民經濟生活是愈來愈富裕，平均教育程度也逐漸提高、出國旅遊的人口比率也越來越多；換言之，臺灣不僅在經濟上逐漸進入已開發國家之林，在政治上也納進了世界民主化的潮流中。在這種經濟富裕化、社會現代化及政治民主化的變遷趨勢中，如表五的分析結果所示，選民也會愈來愈具有民主價值的取向，終會導致民主政治文化的逐漸形成與出現。在種變遷趨勢下，未來的政黨競爭與勢力消長，則可能建立在如何掌握選民這種改變所衍生的種種要求與提供滿足之上；換言之，未來政治分歧的基礎也可能隨著政治環境的改變而發生變化。解嚴前後的政治民主化革新即在於調整威權體制，以配合經濟富裕與社會現代化的同步發展。在威權體制轉變成民主憲政的過程中，尤其是中央民意代表的全面改選，賦予選民對中央政治更實質意義的參與權，這種參與權的擴大與新政治議題的出現，如國家定位、統一或獨立、經濟發展或環保等，必然也構成了政黨在選舉競爭與勢力消長的政治分歧基礎。這些新興的政治分歧或許更為重要，但本文限於篇幅與資料，無法兼顧這方面的討論，僅從既有的經驗性資料中去確認省籍與政治價值的分歧，是構成解嚴前後政治民主化過程中，國民黨與民進黨在選舉競爭中，劃分勢力版圖的政治分歧結構。

從本文的經驗資料分析中，可以發現省籍的差異與民主價值取向的分歧，仍然是當前構成劃分國民黨與民進黨選民羣體的主要基線，而表現在政黨組合的其他人口上與社會屬性上的種種差異，基本上乃是交互切割的分歧。就這層意義而言，國民黨與民進黨都是全民性的政黨，支持者在其他的可能分歧上，並沒有顯著的差異。就省籍與民主價值取向等兩個政治分歧而言，民主價值取向對外省籍一慣支持國民黨的省籍不均衡性，也具有沖淡的平衡作用，亦即兩者並沒有累積性的效果。當然，經驗資料的分析自有一定

的侷限性，但從個體層次的分析中、配合政治變遷過程中的重大歷史事件，對了解解嚴前臺灣政治民主化的總體現象，更可以提供一個詮釋的基礎。

的確，在經歷民主轉型的威權政體中，幾乎所有威權統治時期的執政黨，都不免在政治轉型的大選中失敗下臺，唯有臺灣的國民黨是個例外。從政黨競爭的角度來看，威權統治的執政黨成爲民主改革過程中的代罪羔羊，並不足爲奇，因爲在那些威權政體成功地過渡到民主轉型的國家之中，反對勢力早已獲得「定型」而成爲一個制度化的政黨，可以隨時動員吸收對威權執政黨不滿的民衆，以匯集力量成爲一個可能的政治選項。但臺灣的情形卻不一樣，一方面是既有的在野政黨早已在戒嚴時期的各層級選舉中，通不過選舉的考驗而消失於臺灣選舉的政治的舞臺；另一方面是國民黨在推動臺灣經濟發展與社會現代化的成功，加上逐步開放政治參與的管道，已經有效地吸收了民衆社會現代化過程中所產生的民主改革壓力。臺灣以往的有限選舉（地方及中央民意代表的增補選），不僅提供民衆吸收民主價值的場所，也是反對勢力賴以動員選民而成長的重要基礎。反對勢力的組織化而形成了民進黨，不但推動了政治的民主化，而且也在第二屆中央民意代表選舉的政治參與擴大的過程中，形成與國民黨分庭抗禮的局面。就此觀點而論，作爲威權統治的執政黨而言，國民黨的失敗並不是下臺失掉政權，而在於國民黨以往所建立並賴以壯大的威權體制，卻面臨政治民主化的衝擊而逐漸解體。國民黨的這種失敗在於無法解消民主政治價值所帶來的政治分歧，這種失敗是根源於威權統治本身內在無法「既威權又民主」的性質，雖然這在以往戒嚴的訓政時期中可以暫時得到平衡。這種「民主/威權」的政治價值分歧，沒有被激化成爲推倒國民黨的力量，一方面可說主要是因爲國民黨在戒嚴時期、仍然推行訓政式的「兩元政治」與「本土化」政策，並沒有讓省籍的分歧與政治價值的分歧合流、而形成累積性分歧的分割效果；另一方面也由於臺灣的經濟發展與社會的現代化，逐漸將可能具有分割性質的分歧轉化成爲交互切割性質的分歧。在這樣的發展過程中，廣大的選民雖然樂於見到民主的變革與反對勢力的茁壯以制衡國民黨的威權統治，但卻不會將利益寄託在激化的

政治衝突之上。

假定一個政黨的組成，是匯集政治分歧而獲得「定型」與制度化的一種結果，則民進黨的出現已吸收省籍與「民主/威權」的政治價值分歧。民進黨在這兩種政治分歧累積效果的影響下，已經獲得定型而成為一個制度化的政黨，因此政治立場上可能也傾向於倡導「臺灣獨立」與「反威權統治」，來凸顯「臺灣意識」與「民主改革」的政治訴求。在第二屆國大代表與立法委員的兩次選舉之中，民進黨的政治主張與立場，事實上也獲得一定比率選民的投票支持。這種支持比率並沒有因民進黨的政治立場或主張，遭受大眾媒體與國民黨的大肆批判而銳減。這也說明政治分歧的存在，是社會變遷過程中所衍生的利益上衝突，而代表這種分歧與不同團體利益的政黨，也就是一種社會分歧制度化的政治管道。假定國民黨的威權體質不變，隨著選民逐漸具有民主價值取向的增強改變中，國民黨或許會因為選票的逐漸流失而下臺，然而一個既已存在而較早獲得定型的政黨，必然也會因為組織的發展與生存所需而調整它的因應策略。一旦社會中政治分歧的基線改變而牽走支持的選民時，一個僵化而不能適時調整的政黨，或許就無法通過選舉的考驗而存在了。若以Kay Lawson(1988)所指出的，一個政黨可能扮演參與的、選舉的、依持的(clientelistic)與指導的(directive)四種政治接環功能來看，威權統治所強調的依持與指導的接環功能，在經濟發展與社會走向現代化的過程中，會變得愈來愈不重要，而民主政治所依賴政黨扮演的參與的及選舉的接環功能，反而會顯得愈來愈重要。民進黨的出現而成為一個與國民黨競爭與分庭抗禮的政治組織，即在於說明戒嚴解除前後以來，國民黨在扮演參與的及選舉的接環功能上之有所不足。

總之，民進黨的出現不僅推動臺灣的民主轉型，而且民進黨的制度化過程即為臺灣政治民主化的一部分。臺灣的經濟發展與社會的現代化，雖然延展了戒嚴威權統治的期間，但也同時培育了推動政治民主化同步發展的民主價值信念；民主與威權的價值衝突所形成的政治分歧，加上長久來實施而逐漸擴大範圍的選舉，不僅提供了民進黨成長壯大的動員基礎，也給威權統

治的國民黨從革命性格轉化到選舉性格鋪路。在國民黨法統消失所引起統治正當性危機出現之際，國民黨與民進黨在雙方都能接受的選舉制度之下，互相妥協而開啓台灣政治民主的大門。同時，在解嚴前後選民政治參與權擴大的階段，省籍與政治價值為主導的政治分歧也逐漸獲得定型而形成國民黨與民進黨兩黨選舉競爭的模式。從分割國民黨與民進黨選民羣體的政治分歧來看，省籍的分歧一直是持續存在的一個政治分歧；民主與威權的政治價值衝突，則是解嚴前後逐漸形成的另一個政治分歧。從長遠的角度來看，省籍的分歧會逐漸被政治價值的分歧所沖淡，而未來的政黨競爭與勢力消長，或許愈來愈需建立在民主政治文化生成以後的政治分歧及相關議題上。

(收稿日期：1993年11月5日；接受刊登日期：1994年2月23日)

後記

文中關於1983年、1986年及1989年的增額立法委員選舉、以及1992年第二屆立法委員選舉等調查資料，乃是臺灣大學政治系胡佛與陳德禹等教授主持「臺灣地區選民投票行為研究」計劃項下，歷次所收集之全省性選民的抽樣調查資料。這些大型調查計劃，均由行政院國家科學委員會資助完成的研究計劃。作者特別在此感謝上述計劃研究主持人的允諾使用這些寶貴的資料，同時也要對資助單位、以及背後共同執行但不具名的許多研究同仁表示敬意，由於他們的貢獻才有這些重要的學術資產。當然，資料的解釋與分析若有不妥之處，應責成作者本人。

註釋

- 1 分歧 (cleavage) 一詞常與社會分歧或政治分歧連著使用。社會分歧所指的比較偏向於人口、社會與文化等屬性的差別，而這些差別表現在政治

上的區分，則被稱為政治分歧。在本文中，也是採取這種比較廣義的用法。不同的學者在使用「政治分歧」一詞時，所指的涵蓋的範圍或許也不盡相同。例如，Robert A. Dahl(1966)將「政治分歧」用在政治態度與行為的衝突與區分上；Ronald Inglehart(1977)則將「政治分歧」用在指涉所謂「物質主義」與「後物質主義」等文化價值的衝突與區分之上；而Douglas W. Rae與Michael Taylor(1970: 1-3)更把「政治分歧」界定為：「在特定時空之下，以重要的政治上差異，而將社羣或次級社羣的成員加以區分成不同團體的標準」，並將各種可能造成政治上差異的標準，如種族、膚色、意識型態、偏好、行為等，都涵蓋在政治分歧的範圍中。

- 2 Maurice Duverger (1954: xxiii)指出：「除了美國以外，在1850年之際，世界上的其他國家可能還不知道現代意義的政黨。雖然不乏意見的趨向、流行的俱樂部、哲學討論會與國會的團體等，但沒有真正的政黨。」按照Samuel J. Eldersveld (1982: 25)對美國政黨的研究中指出，大約在1800年的總統選舉時，已出現聯邦黨與共和黨的競爭，而從選舉競爭與組織來看，美國當時的兩個政黨已具備現代政党的特色。
- 3 關於1983年、1986年及1989年的增額立法委員選舉，以及1992年第二屆立法委員選舉等調查資料，乃是行政院國家科學委員會補助臺灣大學政治系胡佛與陳德禹等教授主持「臺灣地區選民投票行為研究」計劃項下，歷次所收集之全省性選民的抽樣調查資料。
- 4 按歐美有關探討政黨組合或解組的研究而言，應該以「政黨認同」來看比較恰當，然而由於資料的限制，以及在一個缺乏政黨政治傳統的臺灣社會，若應用密西根所發展的「政黨認同」測量題目，也會衍生許多適用性的問題。所以在臺灣的情境中，本文只好以「政黨偏好」來替代，實際上在有關臺灣的許多選舉研究中，也都以「政黨偏好」或「政黨傾向」來取代密西根的「政黨認同」測量(雷飛龍、陳義彥等人，1987與1991；徐火炎，1991、1992與1993)。

- 5 如表三與附表一的資料顯示，投無黨籍或其他黨派票的比率很少，而且本文的重點在於分析國民黨與民進黨的勢力消長，故投無黨籍或其他黨派票的選民則不列入分析。

附表一：受訪樣本的選民黨派投票，1983 - 1992

	1983		1986		1989		1992	
	N	%	N	%	N	%	N	%
國民黨	874	79.7	756	73.4	627	71.9	677	68.6
其他黨或無黨籍	40	3.6	73	7.1	54	6.2	48	4.9
(黨外) / 民進黨	(183	16.7)	201	19.5	191	21.9	262	26.5
有效樣本數	1097	100.0	1030	100.0	872	100.0	987	100.0

附錄一：政黨偏好的測量題目

1983年的測量題目：

右邊有一個階梯圖，一邊表示傾向於國民黨，另一邊表示傾向於所謂的「黨外」，中間表示沒有特定的傾向；在每一邊都有三種程度(1表示較低的程度；2表示中等的程度；3代表較強烈的程度)。

(國民黨) 3 - 2 - 1 - 0 - 1 - 2 - 3 (所謂的「黨外」)
(中間)

請問您傾向於那一邊？程度怎樣？

- (1) 國民黨，程度(請填數字)___。
- (2) 所謂的「黨外」，程度(請填數字)___。
- (3) 中間程度。

1986年的測量題目：

請比較您對中國國民黨與民主進步黨的偏愛傾向怎樣？(1表示較低的程度，2代表中等程度；3代表較強的程度)。

	國民黨				無				民進黨				
	3	-	2	-	1	-	0	-	1	-	2	-	3
本人：	<input type="checkbox"/>		<input type="checkbox"/>		<input type="checkbox"/>		<input type="checkbox"/>		<input type="checkbox"/>		<input type="checkbox"/>		<input type="checkbox"/>

1989年的測量題目：

在我們社會裡，有很多人喜歡國民黨，也有很多人不喜歡國民黨；有很多人喜歡民進黨，也有很多人不喜歡民進黨；當然，也有人可能對這兩黨的感覺都差不多，而無任何的偏好；請問您及您的家人對這兩個政黨偏愛的情形怎樣？

(1)中國國民黨：

	喜歡		無		不喜歡		不知道
本人：	<input type="checkbox"/>		<input type="checkbox"/>		<input type="checkbox"/>		<input type="checkbox"/>

(2)民主進步黨：

	喜歡		無		不喜歡		不知道
本人：	<input type="checkbox"/>		<input type="checkbox"/>		<input type="checkbox"/>		<input type="checkbox"/>

1992年的測量題目：

目前國內有兩個主要的政黨，一個是國民黨，另一個是民進黨，請問您在感情上比較傾向支持那個政黨？

(1) 國民黨：〔(續問)請問您傾向國民黨的程度如何？〕

(1) 強烈傾向 (2) 中度傾向 (3) 輕微傾向

(2) 民進黨：〔(續問)請問您傾向國民黨的程度如何？〕

(1) 強烈傾向 (2) 中度傾向 (3) 輕微傾向

(3) 不偏向那個政黨

- (4) 不知道
- (5) 拒答
- (6) 其他(請註明)

附錄二：民主價值取向量表

- (1) 大家的思想如不一致，社會就會紛亂。
- (2) 一種意見能否在社會流傳，應由政府決定。
- (3) 在一個地方(社區)上，如果東一個團體，西一個團體，就會雜亂紛擾，影響到地方的秩序與和諧。
- (4) 一個國家如果政黨太多，會導致政治混亂。
- (5) 政府如果時常受到議會的牽制，就不可能有大作爲了。
- (6) 法官在審判影響治安重大的案件時，應該接受行政機關的意見。

參考資料

袁頌西、陳德禹

- 1988 「臺灣地區民衆的政治文化：系統結構的權力價值取向」，**變遷中的臺灣社會：第一次社會變遷基本調查資料的分析**，中央研究院民族學研究所專刊乙種第二十號，頁299-326。

胡 佛

- 1985 「臺灣地區民衆的參與行爲：結構、類型與模式的比較分析」，**第四次社會科學研討會論文集**，中央研究院三民主義研究所叢刊(18)，頁363-388。

胡 佛、徐火炎

- 1983 「結構性的政治文化：概念、類型與面向的探討」，**第三次指標會議論文集(上册)**，中央研究院三民主義研究所叢刊(12)，頁

47-82。

徐火炎

- 1991 「政黨認同與投票抉擇：臺灣地區選民的政黨印象、偏好與黨派投票行為之分析」，*人文及社會科學集刊* 4(1)：1-57。
- 1992 「民主轉型過程中政黨的重組：臺灣地區選民的民主價值取向、政黨偏好與黨派投票改變之研究」，*人文及社會科學集刊* 5(1)：213-262。
- 1993 「選民的政黨政治取向、政黨認同與黨派投票抉擇：第二屆國大代表選舉選民的投票行為分析」，*國家科學委員會研究彙刊：人文及社會科學* 3(2)：144-166。

黃德福

- 1992 *民主進步黨臺灣的政治民主化*。臺北：時英出版社。

雷飛龍、陳義彥等人

- 1987 「轉型期社會中的投票行為——臺灣地區選民的科際整合研究(II)」，行政院國家科學委員會專題研究計劃結果報告。
- 1991 「臺灣地區選民的投票行為——一個理論模式的探索」，行政院國家科學委員會專題研究計劃結果報告。

Bartolini, Stefano, and Peter Mair

- 1990 *Identity, Competition and Electoral Availability*.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Converse, Philip E., and Gregory Markus

- 1979 " 'Plus ca Change ...': The New CPS Election Study Panel." *American Political Science* 73: 32-49.

Dahl, Robert A.

- 1966 *Political Oppositions in Western Democracies*. New Haven: Yale University Press.

Duverger, Maurice

1959 *Political Parties: Their Organization and Activity in the Modern World*. New York: John Wiley and Sons, Inc.

Huntington, Samuel P.

1968 *Political Order in Changing Societies*. New Haven, CT: Yale University Press.

1991 *The Third Wave: Democratization in the Late Twentieth Century*. Norman and London: University of Oklahoma Press.

Inglehart, Ronald

1977 *The Silent Revolution: Changing Values and Political Styles Among Western Publics*. 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Lawson, Kay

1988 "When Linkage Fails," In *When Parties Fail: Emerging Alternative Organizations*. Kay Lawson and Peter H. Merkl (eds.), Princeton, NJ: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Lipset, Seymour Martin

1959 /1981 *Political Man: The Social Bases of Politics*. Expanded and Updated Edition. Baltimore, MD: The Johns Hopkins University Press.

Lipset, Seymour Martin, and Stein Rokkan

1967 "Cleavage Structures, Party Systems, and Voter Alignments," reprinted in *Consensus and Conflict: Essays in Political Sociology*. by Seymour Martin Lipset. New York: Transactions Books. pp. 113-185.

Powell, G. Bingham, Jr.

1976 "Political Cleavage Structure, Cross-Pressure Processes, and Partisanship: An Empirical Test of the Theory," *American Journal of*

Political Science 20(1): 1-23.

Przeworski, Adam

1986 "Some Problems in the Study of the Transition to Democracy," In
Transitions from *Authoritarian Rule: Prospect for Democracy*.
Guillermo A. O'Donnell, *et al.* (eds.), Baltimore, MD: Johns Hop-
kins University Press.

Pye, Lucian W.

1990 "Political Science and the Crisis of Authoritarianism," *American
Political Science Review* 84(1): 1-19.

Rae, Douglas, and Michael Taylor

1970 *The Analysis of Political Cleavages*. New Haven: Yale University
Press.

Sartori; Giovanni

1976 *Parties and Party Systems: A Framework for Analysis*. Cam-
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Sutter, Robert G.

1988 *Taiwan: Entering the 21st Century*. Lanham, MD: University
Press of America

Electoral Competitions and the Change in Cleavage Structures: The Persistence of Electoral Bases of the KMT and the DPP

Huoyan Shyu

Abstract

Why there is no stunning election in Taiwan's democratic transition? What makes the KMT an exceptional case while most ruling parties of the authoritarian regimes in the world lost elections in their democratization process? To answer these questions, this essay looks at the change and persistence of cleavage structures that divide the electoral bases of the ruling KMT and of the major opposition party, the DPP, with an attempt to bridge the "macro" and "micro" gaps. Historically the successful land reform in the early 1950s not only secured the KMT's rule but deflated the potential opposition forces. However, along with prolonged economic growth, an increasing mass demands for democratic reforms gradually gave birth to an organized opposition, the forming of the DPP in 1986. Finally, this trend of liberalizing change culminated in 1987 that witnessed the lifting of martial law and marked the opening of Taiwan's democratization.

An analysis of electoral survey data collected between 1983 and 1992 shows that ethnicity and democratic values are the major dividing lines between the KMT's and the DPP's supporters. The effect of eth-

nic cleavage on party alignment is found persistent, as Mainlanders are identified to disproportionately vote for the KMT and Taiwanese to the DPP. The authoritarian-democratic value cleavage is also a key variable in predicting opposition voting, as voters with stronger democratic values are shown more likely to cast the DPP vote. The changing values is also functioning as an important leverage for the persistent effect of ethnic cleavage on mass party alignment. In perspective, a two-party dominant system is taking shape in Taiwan's post-authoritarian elections in which the persistence and changes in cleavage structures is thus manifested.